

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续篇)

刘玉堂 刘礼堂

本文是《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的续篇。初篇(载于本刊1993年第3期)曾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南方都市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如果说,初篇探索的都市地处中国中南和东南,那么,续篇所研讨的都市则位于中国西南了。本文通过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西南都市重庆、贵阳、昆明、桂林之间关系的系统考察,不难获得这样一个信息:尽管这些都市同楚国历史文化的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区别和差异,但是,它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不仅在其形成、初生时期已深深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且在后世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上古文化乃至世界上古文化的进程。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境内,楚国是一个地广势强、国力鼎盛、经济发达、文赋纷华的国度。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极盛时的楚国,“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郢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地计众,中分天下。”这里的“南卷沅湘”和“西包巴蜀”明确指出楚国畛域曾一度扩展至今西南地区的桂、川、黔、滇之东部与北部地区。那么,楚文化也必然对上述地区产生过程度不同的渗透。而城市,尤其是著名都市,无疑是文化场的晶核所在,是各文化圈的能量集结奥府与辐射中枢。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著名都市作为文化场的晶核所在,充分发挥了集结与辐射楚文化及其他文化能量的重要功能。探讨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西南著名都市的关系,对于认识楚人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窥视楚文化与百越文化、巴蜀文化碰撞与涵摄的奥秘,以及辨析楚民族与中国上古西南民族之间交往融合的轨迹,都不无裨益。

重庆 重庆,这座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古代曾是巴国的都城,名为江洲。江洲虽由巴人所建,但由于楚巴之间的特殊关系和楚巴文化的交融互摄,江洲也自然受到楚文化的染濡。

巴人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今鄂西南的清江之滨,即古夷水流域,后沿夷水西入川东,建立巴国。据《华阳国志·巴志》称,巴国“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与秦、楚、邓为比”。鱼腹即今四川奉节一带,僰道即今四川宜宾,汉中即今陕西汉中东部,黔涪包括今湘、黔、鄂三省毗邻地带。文献所记楚巴发生关系是楚武王三十八年,即公元前703年。《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翔将巴客以聘于邓……”。后来,由于邓国外交上的错误而导致楚巴联军攻邓,结果是楚替巴报仇,巴为楚获地。公元前

688年,楚巴又联军伐申,由于楚对友军失礼而造成巴楚分裂。《左传·庄公十八年》记:楚“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遂门于楚。……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据《左传·文公十六年》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611年,楚发生饥荒,庸人率群蛮背叛楚国,巴与秦助楚镇压了“群蛮”的叛乱。自此,巴楚关系和好达百余年之久。公元前590年,楚共王即位,纳巴姬,说明双方关系已十分融洽了。然而,楚巴之间后来还是反目成仇。据《左传·哀公十八年》记载,公元前477前,“巴人伐楚围鄢”,“楚败巴师于鄢”。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拒之。”^①《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巴楚数相攻伐,故(楚)置捍关、阳关及沔关(以御巴)”。在巴楚交恶期间,双方互有胜负,但总的说来还是楚国占领巴国的领土要多。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至公元前361年时,“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巴黔中”即曾为巴国之地的黔中,其地包括乌江流域从四川涪陵上溯到贵州遵义、桐梓,西抵乌蒙山脉的威宁一带大片地区^②;也有的断作“巴、黔中”,认为“南有巴、黔中”系指楚人沿江而进,旋又溯黔(今乌江)南下,占有了今川、黔、湘、鄂边界一带地区^③。其实,两种断句并无区别,都是指的楚人占领了江洲和东境黔中一带地区,因为上古之时常以国名代都,巴,即巴之始都江洲。唐司马贞《史记·秦本纪》索隐说:楚宣王时“楚自梁洲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此处“巴渝”,即江洲,隋天皇元年改楚洲置,所在今重庆巴县。司马贞称巴都江洲为巴渝,是以汉时地名称古时地名。楚在夺取了江洲后不久,就势夺得了巴人先王陵墓所在地“枳”^④。

对有关文献记载串连思考,也不难发现楚人曾占领过江洲。《华阳国志·巴志》:“巴始都江洲,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巴人之所以屡次迁都,最后一直退到阆中,无非因为楚人占领了江洲,又步步进逼。否则,凭江州的地理形势和经济条件,巴人是不大会轻易舍它而去的。楚人占领江洲后,仍任用巴人掌管,并迁来楚人于江洲以东,与巴人杂居错处。《华阳国志·巴志》称:“江洲以东,其人半楚”,足以说明楚和巴杂居以及楚人之多。

从楚宣王元年(公元前369年)到楚怀王五十三年(公元前316年),楚人控江洲及其东南部达五十三年之久。在此期间,楚巴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江洲地区无疑得到了集中体现。也就是说,江洲城蕴涵着丰富的楚文化因子。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江洲东南地区,有些墓葬出土了楚国的兵器、礼器和生活器皿,且器物组合同楚地相同^⑤。

也许正因为楚文化对江洲影响之深,故南朝太清四年(公元550年)于江洲故地置楚州,而且在西魏大统末年改巴州后,北周初年又恢复楚州之称。这说明,在后世人们心目中,江洲不仅属于巴,而且也属于楚。所以,《汉书·地理志》说:荆地“与巴渝同俗。”

贵阳 贵阳,作为城市而言,兴起较晚。但是,其地早在战国期间就受到楚文化的浸润。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楚悼王二十年(公元前382年),楚令尹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战国策·秦策三》也说:“吴起相楚悼王,……南攻扬越,北并陈蔡。”扬越为百越的一支,但此处的“扬越”,当即百越。之所以出现这种概念借代的现象,大概由于扬越地广人众,在百越各支系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古人按以个别代一般的惯例,有时以“扬越”代替“百越”,反之亦然^⑥。清人莫与俦的《南齐以上地理考》指出,今贵州乌江以南的地区,多在古扬越地域^⑦。此处的“扬越”,也即百越。《山海经·海内南经》谓:“沅水象郡谭城西”。沅水上段龙头河发源于今贵阳东南不远的都匀市境内,另一条上源安江发源于贵阳东部的福泉县境。楚人自“江南地”溯沅水进入今黔东南、黔南,再折向贵阳和黔西南^⑧,其中贵阳是楚人屯兵防守的要地,是楚人控制贵州的馆毂。《淮南子·兵略训》说楚人“南卷沅湘”,一个“卷”字,足证楚人对沅水上游地域亦囊括无疑。楚人开拓沅江上游

地区后,曾移民至此。据明田汝成《行边纪闻·蛮夷》、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和清李宗昉《黔记》等书记载,居住在今贵阳、龙里、修文、郎岱、大方、威宁、普安、织金等地的“宋家”、“蔡家”,“盖中国之裔也。相传春秋时,楚子蜚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徂,遂流为夷。”根据楚人灭国徙民的惯例,这种判断是可信的。

汉代“南夷”中最大者是位于今贵州黄平、贵定间的且兰国,《南中志》谓楚人庄蹻在此“以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国。”这说明且兰及其近旁诸邑居民自认且兰由楚人始置。

据文献记载,战国中期楚人占领巴黔中后,曾在贵阳北部建立黔县。《汉书·地理志》也载牂柯郡有黔县。黔县因系楚国所置,故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严可望《全汉文》和杨雄《蜀王本纪》皆称黔邑首领为“荆人黔令”,或曰“荆有一人名黔灵”。

《华阳国志》载,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居于今威宁一带的五茶夷曾在当地“发夜郎庄王墓”。这个“夜郎庄王”,很可能是庄蹻后裔。所以,晋王朝将此墓作为重要古迹加以保护,对破坏它的五茶夷、晋宁州刺史“(王)逊因此讨灭之”。

战国后期楚人庄蹻入滇,由沅水登陆后,取道岑巩、镇远、玉屏、施秉至贵阳。后来,庄蹻率众至滇,但其余党支系当有人留居贵阳一带,不然《华阳国志·南中志》何谓其“分侯支党,传数百年”。因此,楚文化对贵阳地区的浸润并非暴风骤雨式的,而是春雨润物式的。

昆明 位于滇池之滨的昆明,其名虽不见于上古,其地却为滇之要邑。《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数。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汉书》也有相同记载。《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虽也肯定了庄蹻王滇之事,但却认为庄蹻王滇的时间应在楚顷襄王时,核之史籍,分析当时具体历史背景,应以顷襄王时为是^①。庄蹻主动接受当地土著民族的文化,甚得民心,从而牢固地控制了滇池一带。直到汉代,滇国的统治者仍是楚人后裔,故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十分肯定地说:“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桓宽《盐铁论·论功》也说:“今西南诸夷,楚庄王之后”。《新唐书·南蛮传》甚至说:“自滇池、夜郎以西,皆曰庄蹻之裔。”这些说法虽难免有夸饰之嫌,但庄蹻在滇池实施了有效地管理却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以昆明为中心的上古滇池地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文明和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的接合地带。以庄蹻为首的具有高度文化秉赋的楚人直接来到这两大文明的交会之区,无疑加剧了这各领风骚的古代两大文明的交相切割,加速了印度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明的西传。

昆明是上古中西文化交流的驿站。公元前320年——315年之间,古印度商那闍著的《政论》一书中,说到当时印度已有从“支那”贩运过去的“成捆的丝”。据苏仲湘先生考证,此处“支那”即指“荆楚”^②,联系到楚国丝织业的高超工艺水平,足证其说不妄。已发现的先秦丝织品,以楚国质量最优。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丝织品35件,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前所未见的^③。这批丝织品,按其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可分为绢、绌、纱、罗、绮、锦、绦、组八类,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品的所有类别,其中绢的密度超过了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的绢,锦的幅度和经纬密度不低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同类出土物的水平。古代蜀锦的水平虽高,但直至东汉才获长足发展,至于先秦北方的丝织业,就更不能与楚国媲美了。由此看来,古印度来自“支那”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楚国的产品,这里还有一个楚国丝绸行销远方的佐证:在苏联巴泽雷克地区出土了楚国丝绸和山字纹铜镜^④。既然楚国的丝绸朝西北方向可以越过阿尔泰山脉,那么朝西南方向越过横断山脉就更不足为怪了。与印度发现楚国生产的丝织品同时,楚国出现了南亚或西亚生产的“蜻蜓眼式”料珠。张正明先生通过对长沙、固始、随州等地出

土的此类料珠的形制、成分、花纹的分析研究,认为楚地的料珠不乏南亚和西亚的产品^⑧。丝绸的西去与料珠的东来,无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古代楚国与南亚之间,存在着一条通道,这条道通的东端是长沙,西端是印度,而其中点则是昆明。尽管这是一条布满风险的古道,它还是被犯艰历险的楚人和滇人所征服。早在本世纪40年代,印度的觉月教授就指出,中国的楚文化与印度东部和南部的文化或许曾相互交通^⑨,而两种文化交通的枢纽,正是昆明。

今昆明东部的曲靖、富源、陆良、寻甸一带,为古劳浸、靡莫居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国“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徐中舒先生谓其首领都是楚国贵族,“劳浸”之“浸”,即是“饮”,两字古音相近,同在《广韵·侵韵》。楚饮姓见于楚惠王、幽王铜器铭文^⑩。其“劳”,即越人“骆”的异写。劳浸连称,即此部族由越人和楚人共同执政。“靡莫”之“靡”,即楚王族从母系所继承之姓“嫪”的异写。春秋《楚季盘》、《楚王钟》等铜器铭文均见“嫪”字,但更多的器物则写作“𡗗”字。𡗗即嫪。直到南北朝时期,当地居民仍以楚人后裔自命。如在今陆良县境发现了刘宋《爨龙颜碑》,碑文谓爨氏是“颡颥之玄孙,才子祝融之眇胤(苗裔)也”,并谓爨氏先人曾“霸王郢楚”,“诏德于春秋”的令尹子文是其祖宗。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这些部族与滇国“皆同姓相扶”。“劳浸”和“靡莫”的楚人究竟是庄蹻王滇时的同党,还是此前楚国的移民,尚难断定,但由此可以看出楚文化对滇池地区的影响之深远。

桂林 一度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的桂林,不仅以其旖旎的自然风光闻名天下,也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驰誉古今。

据史书记载,桂林最早作为城邑名出现是在魏晋时期,三国东吴将桂林作为始安郡治所。然而,早在战国中晚期,楚人已控制了今桂林地区,桂林城的兴起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战国策·楚策》记苏秦对楚威王说,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邠阳之塞郢阳,地方五千里”。虽然苏秦之语较之《淮南子》所说四境略有变化,但所说南境仍大致相近。对南境“苍梧”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说是指湖南与广西、广东交界的九嶷山地区。《史记·苏秦列传》张守节《正义》说:“苍梧山在道州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上画有九嶷山,其下书有“帝舜”二字^⑪,与《山海经·海内南经》说“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相合。张琦《战国策释地》则具体指出:“古苍梧,汉零陵郡也,今永州府至广西全州也”。一说是指广西的苍梧,包括今梧州一带。《史记》司马贞《索隐》说,苍梧就是《汉书·地理志》上的“苍梧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后,在今广西梧州地区设立苍梧郡,郡治广信在今梧州。如按前一说,楚南境在今广西全州一带;按后一说,楚南境应在今广西梧州地区。全州位于桂江上游,梧州位于桂江下游,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实际,位于桂江中游(又称漓江)的桂林地区都无疑属于楚人控制范围。因为对于流程并不太长的桂江流域来说,楚人既然能占领上游必然会占领中游,同样,楚人占领了下游更不可能越过中游和上游。

《战国策·楚策》记载楚威王时范环说楚国因越之乱,曾“南察濊湖而野江东”。《史记·甘茂列传》记此事时将“范环”作“范蜎”,“楚威王”作“楚怀王”,“濊湖”作“厉门”。据蒋廷瑜先生考证,“濊湖”就是“厉门”,地当广西荔浦、平乐之间,是楚国到岭南的重要关隘^⑫。唐代杜佑《通典》卷184载:桂林“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秦为桂林郡”。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2也说:桂州(今桂林地区)“春秋时越地,十国时服于楚,战国时为楚越之交境”。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中说得更详:静江府(今桂林地区)“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看来,唐宋以来的地理著作大都把战国时期楚与百越之界划在荔浦、平乐之间,这是颇有见地的^⑬。而桂林位于荔浦以北,显然已属楚地了。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例证,在广西平乐银

山岭发掘的战国墓,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木椁,随葬品中的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楚风,尤其是墓中出土的长宽身、圆首茎、茎上有二道凸箍、格成凹字形的铜剑,更是江淮流域楚墓中常见之物^③。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了楚怀王时期鄂君启金节,记述了当时楚国水陆交通的主要路线^④。其中有“自鄂往,……,内湘,庚牒,庚郢阳”句。据考,这是自楚郢都出发,往西南行的水路^⑤。据有关专家论证,这个“郢阳”,就是《汉书·地理志》零陵郡之“郢阳”,也即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地图所标县名“桃阳”,其地位于今广西全州一带。既然楚怀王时代楚国鄂君的舟船可以通过郢阳,说明郢阳已是楚国的城邑关戍所在,其附近地区至少也是楚国的直接管辖范围,楚国版图无疑已向南越过郢阳进入湘江的上游,其实际控制的地盘扩及更南^⑥。在广西灌阳和兴安发现的战国墓葬,都是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陶深腹圜底蹄足鼎、细颈圆腹圜底绳纹罐和圆首茎上有二道凸箍的长铜剑等。特征和湖南楚墓基本相同,说明楚人势力已深入该地^⑦。

* * *

上文只是对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西南都市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西南都市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都市所在地虽然非楚王国直接控制之区,但却一度成为流寓楚人拥兵自立,“变服从俗为长”之所,其城或系楚人始置,或系异族人始置而由楚人所扩建,此类都市有贵阳和昆明;第二种类型是都市长期处于楚疆与异族、异国疆域犬牙交错地区,也是楚文化圈与异族文化圈相交叠印之处,并一度沦为楚域或为楚人势力所及,此类都市有重庆和桂林。不过,尽管这些都市同楚国历史文化的关系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和差异,但是,它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不仅在形成、初生时期已深深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且在后世中国南方文化尤其是西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列宁曾经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⑧。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的文化,集中表现为城市文化。这是因为,城市以其新型的自然物和人工物的组合,在一定地域空间形成一种社会中心,这种社会中心以其独特的功能,综合、协调、播扬着人们的行为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众所周知,每一个文化圈都有文化场,每一个文化场都有其晶核。假定把城市比作文化场的晶核所在,那么,它无疑是各文化圈的能量集结奥府和能量辐射中枢。在春秋战国这个空前的文化大激荡、大切割、大融摄的文化轴心时代,中国西南都市责无旁贷地履行了文化场晶核的职能。

城市的文化集结功能,使得中国西南都市成为凝聚各种文化的焦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最主要的文化为滇文化、夜郎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以吴越文化为表率的百越文化。在这灿若繁星的文化群体中,楚文化是融合了华夏文化的精髓和蛮夷文化的津液而形成的一种高势能文化,理所当然居于优势地位。因此,虽说上述都市在其早期分别属于巴蜀、夜郎、滇、百越文化圈,但高势能的楚文化则随着楚疆的拓展和楚人的播迁而相继被这些都市所吞纳。

城市作为文化的集结处,并非仅仅让各种文化互不相扰地充斥其间,而是在集结的同时兼有化合诸种文化的功能。本来,不同民族或国度的“社会距离”,难免产生不同文化的相斥性或曰排他性。然而,这种相斥性并非永恒不变,在城市这个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文化冲突中的对立诸面不可避免地在相互撞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身原有的结构,各自从对方吮吸于已有用的文化特质,从而在对流、互补、整合、调适的过程中趋于一体化,升华至新的境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西南和东南都市正是通过对诸种文化的集结与化合,才推出了灵巧、清奇、俊逸的南方文化,同谨严、雄浑、庄穆的北方文化竞辉争妍,形成中国文化长河中的双子座。魏晋特

别是隋唐以降,中国西南都市之所以能保持其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地位,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先秦时期南方诸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在西南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基因作用不可低估——这种基因以变革性、开创性、兼容性、适应性为主体特征。

城市所拥有的强大文化力度,使得西南都市不啻是集结诸种文化的奥府和化合诸种文化的熔炉,更重要的是将这种经过化合的高品位文化向周边辐射。西南都市的这种文化辐射功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上古文化乃至世界上古文化的进程。无论是丝绣的西传、木舟的东渡,还是铁器的南适、铜器的北输,无一不同中国西南都市的强劲文化辐射息息相关。

文化,并非诸成分的机械拼接,而是各要素有机组合的整体,是不断进行物质交换、能量转换、信息传递的动态开放系统。文化除具有共时态的综合特征外,还有历时态的积淀特征,且具延续性和变异性的双重品格。这些特征和品格,只有在都市文化中才能获得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春秋战国及此后西南都市的文化特征和品格对于南方文化的象征意义,便提供了毋庸置疑的证明。

注 释:

- ① 《史记·楚世家》
- ② 蒙文通:《巴蜀史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
- ③ 何浩:《周初的监国制与战国的楚监巴》,《历史知识》1989年第9期。
- ④ 《战国策·燕策二》
- ⑤ 林奇:《巴楚关系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 ⑥ 刘玉堂:《论湖北境内古越族的若干问题》,《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
- ⑦ 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引
- ⑧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 ⑨ 刘玉堂:《论庄跻其人其事》,《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 ⑩ 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 ⑪ 荆州博物馆:《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丝织品》,《文物》1982年第10期。
- ⑫ 参考C·H·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潘孟陶译文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 ⑬ 张正明:《料器与先秦的楚滇关系和中印交通》,《江汉论坛》1989年第11期。
- ⑭ 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 ⑮ 徐中舒:《夜郎史迹初探》,《夜郎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⑯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江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
- ⑰⑱② 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 ⑲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 ⑳ 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郡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 ㉑ 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
- ㉒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三十年来广西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 ㉓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4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